

# 可持续信息鉴证研究:回顾与展望

李明辉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全球范围内自愿实施可持续信息鉴证(SA)的公司不断增多。学者们在实务调查和描述的基础上,对 SA 的动因、后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了解自愿性 SA 决策的动机、作用及影响因素。不过,目前 SA 研究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广度、深度等还有较大的可提升空间,尤其是基于中国背景的 SA 深层次研究仍很匮乏。未来应在实务调研的基础上从更多层面、采用更多元方法深入探究 SA 的动因与后果,并着力构建中国自主 SA 知识体系。

**[关键词]**可持续信息鉴证(SA);可持续发展报告;ESG 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报告鉴证;可持续发展风险;可持续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6)02-0032-15

## 一、引言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被越来越多地接受以及环境与气候问题的日渐突出,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愈加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基于满足利益相关者信息需求、表明自身经营的合法性等目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布单独的可持续发展(或 ESG)报告或在年报中披露相关信息<sup>[1-2]</sup>。然而,如果可持续发展报告没有经过第三方的独立鉴证,其可信性将会存疑,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在此背景下,一些企业主动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或其他专业机构对其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相关信息、指标进行独立鉴证。可持续信息鉴证(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或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以下简称 SA)不仅是提高可持续信息披露可信性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事务所新的业务增长点。根据毕马威(KPMG)的统计,全球财富 250 强公司(GFT250)对可持续发展报告(含 ESG 等类似主题报告,下同)实施鉴证的比例不断提高。2024 年,96%的 GFT250 公司披露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 69%的报告经过了鉴证<sup>[3]</sup>。

我国早在 1995 年就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出台大量政策规定,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 ESG 工作及信息披露。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实施 SA 的上市公司数量和比例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直到 2020 年后,由于可持续发展报告制度的实施、境外交叉上市公司的推动、部分公司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等原因,实施 SA 的公司数量才有所增长。

随着 SA 实践的发展,国内外关于 SA 的研究正迅速升温。本文研究目的在于,在对国内外 SA 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就未来研究提出建议,从而为进一步推进 SA 研究尤其是中国背景下的 SA 研究提供参考。本文边际贡献包括:(1)兼顾理论与实务研究,同时从实践调查与描述、规范与实务研究、动因与后果等方面对 SA 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2)从研究视角(层面)、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等方面就进一步推进 SA 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3)初步构建了 SA 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为未来研究提供指引。

已有一些学者对 SA 或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sup>[2,4-6]</sup>。本文与 Venter 和 Eck<sup>[4]</sup>研究的差异在于,本文不是以研究方法为脉络,而是以研究内容为脉络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且,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着重就我国 SA 研究提出建议,因而对我国 SA 研究的启示意义更大。Zhou<sup>[2]</sup>所回顾文献的重点不在于鉴证,而在于气候及其他可持续信息的披露。Hazaea 等<sup>[5]</sup>则是对 SA 的研究趋势进行分析,对于具体研究内容涉及较少。本文与乔璐等<sup>[6]</sup>研究的差异在于,乔璐等<sup>[6]</sup>研究实质是基于文献对 ESG 鉴证的概念、规范和实务进行

[收稿日期]2025-07-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32004)

[作者简介]李明辉(1974—),男,江苏金坛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从事审计学与公司治理研究,E-mail:xdlmh@163.com。

介绍, 文末的建议也侧重于 ESG 鉴证相关规范与实践; 而本文则是对 SA 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并就未来 SA 研究提出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比 ESG 更广泛,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范围并不仅限于 ESG 事项。因此, 严格来说, 可持续发展报告与 ESG 报告并不完全相同。但从相关准则制定机构和其他专业组织来看, “可持续发展报告”和“ESG 报告”两种提法并存。上市公司披露实践中同时存在“社会责任报告”“ESG 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不同叫法。鉴于此, 本文对“可持续信息鉴证”“ESG 报告鉴证”不作区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现有规范和文献中同时并存“可持续报告鉴证”“可持续信息鉴证”提法。“可持续报告鉴证”着眼于“报告”, 主要是指对整个报告或者对报告中一部分内容与指标进行鉴证; 而“可持续信息鉴证”着眼于“信息”, 既可以是对整个独立报告进行鉴证, 也可以是对包含在年报中的可持续信息披露部分鉴证, 甚至可以是独立报告或年报中部分指标或信息鉴证, 因而含义更为广泛。在这一意义上, 称作“可持续信息鉴证”可能要比“可持续报告鉴证”适用性更广、更切合实际。尤其是我国 2026 年 1 月颁布的《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 6101 号——基本准则(试行)》(以下简称《基本准则》)采用“可持续信息鉴证准则”的提法, 预期国内会有更多学者采用“可持续信息鉴证”提法。因此, 尽管国外文献多采用“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提法, 但为了与我国《基本准则》保持一致, 本文采用“可持续信息鉴证(SA)”的提法。

## 二、现有研究进展

### (一) 关于 SA 实务调研与描述的研究

#### 1. SA 实务现状

KPMG、IFAC 等专业组织采用内容分析、描述性统计等方法, 对全球 SA 实践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如 KPMG 自 1993 年开始连续对全球可持续报告披露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 其中涉及对鉴证情况的统计分析。一些学者也从鉴证主体、层次、范围等方面对全球 SA 实践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sup>[7-8]</sup>。这些描述性研究表明, 总体上, SA 在全球范围内愈加受到重视, 但由于法律制度、商业文化等的差异, 不同国家和地区 SA 的发展状况有较大差异。这为后续在宏观层面研究 SA 决策的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还有文献对美国<sup>[9-10]</sup>、中国<sup>[11-12]</sup>等特定国家的 SA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对不同国家的 SA 实践进行比较<sup>[13]</sup>。这不仅有助于了解相关国家 SA 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 而且为探究 SA 决策及其业务特征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思路。

#### 2. SA 报告内容分析

一些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SA 报告进行了分析<sup>[14-15]</sup>。这些研究有助于透过 SA 报告了解具体实践, 从而为评价 SA 的质量和作用提供支撑。

#### 3. SA 的困难与问题

研究表明, 从业者的理解偏差<sup>[16]</sup>、道德问题<sup>[17]</sup>、国家层面制度和强制性规则的缺乏、可持续报告披露制度不完善、鉴证独立性以及鉴证成本<sup>[18]</sup>等问题都会阻碍 SA 的发展。

#### 4. 内外部审计师和利益相关者对 SA 的参与

(1) 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在验证方面的专业知识使其能够在 SA 市场发挥潜在的广泛作用, 尤其是审计师在验证关键定量信息、评估相关流程与控制方面的能力使其具有竞争优势<sup>[19]</sup>。因此, SA 业务可以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带来新的业务增长机会<sup>[20]</sup>, 并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行业吸引人才<sup>[21]</sup>。但无论是在美国<sup>[22]</sup>还是中国<sup>[23]</sup>, 注册会计师行业对可持续发展业务的介入程度都不够。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标准及鉴证准则不统一是阻碍事务所开展 SA 业务的重要原因<sup>[21, 23]</sup>。在我国, 政府对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监管不够、客户需求不足、事务所自身对 SA 业务认知不够、相关人才和知识储备不足以及对风险的担忧也是阻碍事务所开展 SA 业务的重要因素<sup>[23]</sup>。

(2) 内部审计。一些文献分析了内部审计职能(IAF)在 SA 中的作用<sup>[24-25]</sup>, 并利用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 IAF 参与 SA 程度的因素<sup>[26-27]</sup>。

(3)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有助于保证可持续报告中信息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其参与鉴证服务的有效性和强度是保证整个鉴证过程公平和鉴证质量的基本条件<sup>[28]</sup>。因此, 为了解决 SA 可信度和可靠性问题, 有必要提高鉴证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但在实践中, 利益相关者在 SA 长期处于缺失状态,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SA 的有效性<sup>[29]</sup>。不过, 利益相关者对 SA 过程的参与程度正在逐渐提高<sup>[30]</sup>。

## (二)关于SA监管及具体实务问题的研究

### 1. SA的强制性问题

目前,在多数国家,SA均为企业自愿行为。但从趋势来看,SA正逐渐由自愿转为强制。欧盟2017年生效的Directive 2014/95/EU将是否强制要求鉴证的权力交给各会员国。但2023年1月5日生效的欧盟公司可持续报告指令(Directive(EU)2022/2464)规定,受该指令约束的公司必须根据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披露可持续信息并进行鉴证,从而将SA变为强制性要求。2024年3月6日,美国证监会发布了33-11275号规则,规定大型加速编报公司和未获豁免的加速编报公司需披露重要的排放信息并提供有限保证水平的鉴证报告;转换期结束后,大型加速编报公司需提供合理保证水平的鉴证报告。由于上述强制性SA制度实施时间尚不够久,相关经验性研究尚未出现。但已有一些文献对法国、南非、印度等强制性SA制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到的结果为冲突性结论:Jeriji和Nasfi发现强制性SA会提高公司价值<sup>[31]</sup>,而Pandey等发现强制性鉴证要求会产生负的市场反应<sup>[32]</sup>。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国家鉴证机构发育程度、投资者群体以及投资者保护法律等基础设施存在差异。

我国对于SA一直采取自愿立场。对此,一些学者认为,鉴于大多数上市公司缺乏接受鉴证服务的积极性,为保证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我国也应当建立可持续报告强制鉴证制度<sup>[33-34]</sup>。沈洪涛等对SA需求者、提供者及预期使用者的访谈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我国SA应该从自愿逐步发展到强制<sup>[18]</sup>。但也有学者认为,应给予公司一定过渡期或对小规模企业予以豁免<sup>[35]</sup>。刘明辉和王鹏程则认为我国SA应遵循先强制披露后强制鉴证、从部分指标鉴证到报告整体鉴证、从有限保证到合理保证的分步推进策略<sup>[36]</sup>。上述观点的取舍尚需理论或实证证据的支持。尤其需要对不同规模企业强制性SA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评价,并将其与自愿性SA进行比较。

综上,在国内外,是否强制实施SA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强制实施、强制性SA的效果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 2. SA准则

一些学者对现有准则进行了比较并就其国际协调问题进行了探讨<sup>[37-38]</sup>。一些学者还在介绍国外准则的基础上对我国鉴证准则的制定提出建议<sup>[34,39]</sup>。本文认为,除在条文上对准则进行简单对比和介绍外,还有必要进一步比较不同鉴证准则的实施效果(包括SA用户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异),以便为我国准则制定提供参考。

### 3. SA具体实务问题

一些文献对SA的技术、流程、方法等具体实务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鉴证标准和程序<sup>[40]</sup>、鉴证风险评估与应对<sup>[41-42]</sup>、区块链技术的应用<sup>[43]</sup>、基于审计4.0的ESG鉴证方法<sup>[44]</sup>、重要性的确定<sup>[45-46]</sup>等。但目前直接与从业者接触、深入研究SA过程及具体技术方法的文献仍较少。

## (三)关于SA动因、后果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1. SA决策的动因与影响因素

(1)宏观环境特征。一些文献基于合法性或利益相关者理论,考察了公司所处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商业文化对SA决策的影响。就商业文化而言,多数文献发现,利益相关者导向国家的公司更倾向于实施SA<sup>[47-50]</sup>。但对于法律制度与SA决策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得出了正向<sup>[47]</sup>、负向<sup>[49,51]</sup>和不显著<sup>[50,52]</sup>三种不同结论。多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上述结论分歧:首先,在理论上,法律制度与SA之间的关系本身就较为复杂。法律制度可能会促进企业实施SA以表明其经营合法性的动力,但法律制度与SA之间也可能存在替代关系。因为,针对可持续信息披露的法律制度越严格,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实施SA来保障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的必要性将越低。法律制度还可能会影响鉴证者的法律风险,从而降低其在缺乏明确规范情况下开展SA业务的动力,进而减少SA的供给。其次,法律制度的内涵多维,既包括法律渊源和具体立法,也包括执法机制。立法完善但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并不意味着法律制度完善,且不同文献测量的侧重点可能不同。最后,其他制度的影响。例如,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法域,法律的“强制”效应可能被市场机制部分替代;而在新兴市场,法律制度的作用可能更为凸显。商业文化、媒体监督等非正式制度也可能与法律制度产生交互影响。除法律和商业文化外,可持续报告框架<sup>[10,52]</sup>、行业特征<sup>[52]</sup>及行业同群效应<sup>[10]</sup>也可能影响SA决策。

(2)微观特征。现有文献从如下方面研究了微观公司特征对SA决策的影响:①媒体报道与ESG负面消息。媒体关注会促使企业关注可持续发展,并通过SA来提高自身声誉;负面报道则可能产生合法性需求,从而促使企业实施SA,尤其是在企业面临ESG危机的情况下<sup>[53-54]</sup>。②公司治理机制。相关文献基于代理理论、资源依

赖理论考察了董事会规模<sup>[55]</sup>、独立性<sup>[55]</sup>等特征以及董事会下属的环境<sup>[56]</sup>、可持续发展<sup>[55]</sup>、审计<sup>[57-58]</sup>等专门委员会特征对 SA 决策的影响。虽然一些文献发现独立、多元的董事会能促进 SA<sup>[55]</sup>,但环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 ESG 相关治理机构与 SA 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③薪酬合约中纳入 ESG 指标。当 ESG 与自身利益相关时,管理层为表明其可持续发展业绩、消除股东对其可能存在“漂绿”行为的疑虑,有动力实施 SA<sup>[59]</sup>。④信息不对称程度。Fan 等发现,碳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公司更有动力自愿聘请外部机构对其温室气体报告进行独立鉴证<sup>[60]</sup>,这与信号传递理论相一致;但当公司碳披露质量较高时,碳鉴证的可能性更高,表明此时碳披露实际上是管理层表明其行为合法性的手段,而不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手段。⑤ESG 绩效。Braam 和 Peeters 发现,可持续发展绩效好的公司更可能实施 SA,因为这样的公司更能承受鉴证成本<sup>[50]</sup>,从而支持了信号传递理论,而拒绝了合法性理论。不过,在不同环境下,公司究竟基于信号传递还是合法性目的来实施 SA 可能是不确定的。内生性问题也会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究竟是 ESG 绩效好的公司更可能实施 SA,还是 SA 会提高 ESG 绩效?⑥管理层能力。Kao 等发现,管理层能力与公司自愿披露 ESG 信息并寻求报告第三方鉴证的意图呈正相关关系<sup>[61]</sup>,从而支持了资源依赖理论。但管理层短视、职业生涯顾虑、声誉、成长经历、专业背景等其他特征对 SA 的影响尚有待考察。⑦财务审计师特征。Fernandez-Feijoo 等发现,财务报告由“四大”审计的公司更有可能实施 SA<sup>[62]</sup>。在中国,开展 SA 业务的事务所也主要是“四大”,这可能与“四大”能够聚集更多 SA 业务所需人才、更具国际视野、更早关注可持续信息披露及其鉴证有关。除事务所规模外,事务所和合伙人对 ESG 事项的关注度、环境专长等特征也可能会影响其对 SA 的参与,但目前尚缺乏相关研究。

## 2. SA 业务特征的影响因素

(1) 鉴证者类型(主体)。由事务所来提供鉴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对高质量 SA 的需求。因为审计行业拥有完善的“全球”标准、一系列道德和独立性要求、事务所和项目层面的质量控制机制,这些特征可以确保其所提供的鉴证服务有始终如一的高质量<sup>[47]</sup>。在西方,事务所在 SA 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sup>[63-64]</sup>。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鉴证业务与审计业务间的知识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及审计市场竞争加剧,都促使事务所积极拓展 SA 业务。而事务所也可以凭借与客户多年在审计方面的业务联系、在审计与鉴证方面的品牌积累以及知识溢出效应所带来的成本降低等优势,更方便地承接审计客户的 SA 业务。相关文献从公司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环境和商业文化<sup>[47-49]</sup>、公司治理<sup>[55-57]</sup>、财务审计师特征<sup>[9,62,65]</sup>、ESG 绩效<sup>[50]</sup>等角度研究了公司是否选择事务所进行 SA 的影响因素,但结论迥异。就宏观环境而言,无论是商业文化还是法律制度,关于其与鉴证者类型的关系,现有文献的结论均不一致<sup>[51-53]</sup>,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国家中 SA 市场的竞争程度、事务所拓展 SA 业务的动力不同,法律制度与商业文化、公司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差异。就公司治理而言,虽然现有文献发现董事会<sup>[59]</sup>和审计委员会<sup>[62]</sup>的独立性等治理特征会提高公司选择“四大”进行鉴证的可能性,但关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对鉴证者选择影响的结论却不完全一致<sup>[55,66]</sup>。其可能的原因包括:不同国家和地区“四大”的市场势力、SA 市场竞争程度不同,这会影响“四大”在 SA 市场中的地位;不同公司中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差异也可能会影响其选择偏好。此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既可能更加重视 SA 从而促进企业选择“四大”进行鉴证,也可能会因为其本身能够提高可持续发展绩效从而降低公司通过 SA 来表明合法性或传递信号的需求。

(2) 鉴证保证水平。有限鉴证业务的保证水平、鉴证程序的性质和时间均异于合理鉴证业务,鉴证程序的范围更小,成本也更低。从实践来看,多数 SA 都是有限保证。从理论上说,法律法规的要求、可持续信息对内外部决策者的作用、组织偏好和对鉴证成本效益的考量是影响 SA 保证水平选择的重要因素。目前,关于保证水平选择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仅有一些文献从董事会和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特征<sup>[67]</sup>、内部审计特征<sup>[67]</sup>、可持续发展绩效<sup>[50]</sup>、商业文化<sup>[50]</sup>等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中国,保证水平的选择可能更多取决于监管者的态度、鉴证者和公司的法律责任、鉴证成本与效益的对比、同行公司的做法等因素。

(3) 鉴证范围。公司既可以选择对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某一特定部分信息或部分指标进行鉴证,也可以对整个报告进行鉴证。鉴证范围越大,鉴证成本越高,鉴证质量也越高。在理论上,影响企业对 SA 鉴证范围选择的因素包括:①利益相关者影响。《AA1000 鉴证准则(第三版)》指出,在确定鉴证范围时,应考虑组织财务报告的边界及财务报告边界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供应链)的重大影响。②法律规章。IAASB 指出,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全部可持续信息都必须根据既定标准报告并接受鉴证;而在另外一些司法管辖区,法律规章仅要求与气候相关的可持续信息需接受鉴证。③商业文化、企业 ESG 绩效等因素。在利益相关者导向国家/地区,可持续发

展绩效较好的公司期望通过更广泛的鉴证范围来对外传递信号;而在股东导向国家/地区,无论可持续发展绩效好坏,公司都不太愿意承担更高的鉴证成本以扩大鉴证范围,因而鉴证范围普遍较小<sup>[50]</sup>。本文认为,除强制性规定原因外,公司对 SA 鉴证范围的选择,可能更多地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某些非财务信息鉴证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也会促使鉴证机构仅对部分信息进行鉴证。未来可从利益相关者影响力和要求、行业惯例、交叉上市和融资需求、事务所行业专长等角度研究鉴证范围的影响因素。

(4) 鉴证质量。Hummel 等将鉴证质量定义为鉴证者发现并报告客户可持续报告系统中问题的联合概率,并认为鉴证质量包括鉴证流程深度和鉴证报告广度两个关键要素<sup>[68]</sup>。鉴证流程深度是指鉴证流程的强度,涉及鉴证范围、鉴证所涵盖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的程度、鉴证保证水平、所运用方法的种类、是否评估了报告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提供了建议,有深度的鉴证流程更有可能揭示存在的问题;鉴证报告广度是指鉴证报告中包含报告要素最低要求的程度,更全面的鉴证报告(即更高鉴证报告广度)能够使读者更好地评估鉴证流程和鉴证结果。一些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从鉴证报告的完备性来度量 SA 质量:如果鉴证报告较多地包含 AA1000、FEE、GRI 等鉴证准则中所规定的要素,则表明鉴证是高质量的<sup>[14,65,69-70]</sup>。这些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为度量鉴证质量进而考察其影响因素和后果提供了思路。在对 SA 质量进行测度的基础上,现有文献研究了鉴证者类型及行业专长<sup>[68-72]</sup>、审计委员会等公司治理特征<sup>[65]</sup>、可持续发展绩效<sup>[68]</sup>、投资者保护制度<sup>[50]</sup>等因素对 SA 质量的影响。总的来说,关于 SA 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还较少,研究广度和深度均不及财务报表审计质量。

### 3. SA 的经济后果

(1)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一些基于实验、访谈的研究发现,SA 可以提高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可信度<sup>[73-74]</sup>及用户对相关信息可靠性的感知水平<sup>[75]</sup>,但 SA 的作用也与鉴证主体<sup>[73,75]</sup>、保证水平<sup>[75]</sup>等业务特征有关。一些经验研究文献也发现,SA 能够提高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sup>[10,76-77]</sup>、减少 ESG 评级分歧<sup>[78]</sup>。不过,也有一些文献发现,SA 在保证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作用存疑<sup>[69,79-80]</sup>。本文认为,SA 究竟是一种能够实质性提高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的手段,还是一种用来“漂绿”的工具,既取决于公司自身的动机,也取决于鉴证机构执业质量、业务特征以及内外部环境。就动机而言,如果公司自身缺乏强大的内驱力去提高可持续发展信息质量,就不大可能积极购买高质量的鉴证服务,鉴证就更可能是表象化的。例如,与基于同群效应而实施的被动式鉴证相比,基于信号传递目的的主动式自愿鉴证更可能是实质性的。就鉴证机构而言,是否有充分胜任的鉴证人员、有效的鉴证程序和质量保证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鉴证质量,进而影响鉴证的作用。就外部环境而言,在相关基础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鉴证更可能是象征性的。例如,在虚假陈述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严格、鉴证机构声誉损失成本高、监管部门制定有明确可行的鉴证规范、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的情况下,鉴证更可能是一种实质性的质量保证机制;反之,在公司和鉴证机构的虚假陈述行为法律责任制度欠缺、鉴证机构声誉损失后果较小、鉴证者缺乏明确准则和指引、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披露并不关注的情况下,鉴证更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甚至成为“漂绿”的工具。此外,立场不同的群体对鉴证作用的想法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限的文献关于鉴证对 ESG 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看法不一是一种正常现象。关键是要进一步找出导致结论差异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就是影响 SA 作用的关键变量,这正是下一步研究需要着重考虑的。

(2) 可持续发展行为与绩效。高质量的 SA 在提高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的同时,也能推动企业加强可持续发展行动<sup>[81]</sup>、提高可持续发展绩效<sup>[10]</sup>,其原因在于:首先,高质量鉴证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漂绿”行为,从而促使公司加大可持续发展投入、避免“言行不一”。其次,高质量的鉴证可以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行为的透明度,使得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更准确地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sup>[82]</sup>,加强对公司可持续发展行为的监督。再次,高质量的鉴证可以促使企业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向包括 ESG 基金及其他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表明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推动管理层加大可持续发展投入<sup>[83]</sup>。最后,高质量鉴证有助于企业了解其在可持续行为及相关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而提高 ESG 绩效和投资效率<sup>[10,84]</sup>。不过,SA 是否能够带来更好的可持续发展行为及其绩效,与鉴证质量、鉴证动机、公司是否建立有相关整改落实机制等因素有关。

(3) 财务报告质量。高质量 SA 不仅能提高 ESG 信息披露质量,而且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sup>[85]</sup>、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sup>[86]</sup>,其原因在于,实施 SA 的公司往往更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更遵守社会规范;并且,SA 会提高透明度、减少管理层盈余管理空间。但如果 SA 本身是机会主义行为,其是否能发挥上述作用,就存在疑问。

(4) 投资者决策与公司价值。有文献发现, SA 能够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意愿<sup>[87]</sup>、吸引机构投资者<sup>[10]</sup>、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sup>[31, 88]</sup>、降低 H 股相对 A 股的折价幅度<sup>[89]</sup>。不过, 对于像中国这样非专业性个人投资者数量众多的市场, 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真的关注 SA, 尚需进一步证据。

(5) 融资。一些文献发现, SA 不仅能够降低债务成本<sup>[90-91]</sup>, 而且能够降低权益资本成本<sup>[92]</sup>。不过, 这一关系究竟来自 SA 自身的信号传递等直接作用, 还是 SA 对可持续报告作用的强化,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6) 利益相关者反应。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及 SA 的理论基础之一, 但仅有极少数文献考虑了 SA 对股东、债权人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sup>[65, 72]</sup>。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SA 能够在 ESG 绩效与信息披露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并有助于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公司价值。不过, 也有文献发现, SA 可能只是管理层合法性管理的工具, 其在提高可持续信息披露可信度、缓解利益相关者代理冲突等方面并未产生实质性作用<sup>[65, 79-80]</sup>。公司所处环境(如法律、监管)、公司实施 SA 的动机及相关治理机制、鉴证者类型、鉴证业务特征、鉴证质量、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发展及鉴证的关注等因素都会导致结论的差异。此外, 在研究 SA 后果时, 有时很难将鉴证的后果与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自身作用区分开<sup>[2]</sup>, 这会导致结果的差异及可能的偏误。

### 三、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文献利用国别数据或特定国家(地区)公司数据, 在对相关实践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 从宏观环境和公司微观特征角度研究了公司 SA 决策及其业务特征的影响因素, 从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可持续发展行为与绩效、融资、投资者意愿、市场价值等角度研究了自愿性 SA 的后果。这些研究对于理解自愿性 SA 的动因、后果及相关影响因素具有积极意义。不过, 总体而言, SA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研究话题的广度、深度都有待提高。具体而言, 现有 SA 研究存在如下不足或可进一步拓展之处。

#### (一) 研究视角不够全面

Cohen 和 Simnett 在探讨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研究议题时, 建议同时从市场、组织、个体/团队三个层面来研究社会责任报告鉴证问题: 在市场层面, 运用代理、利益相关者、合法性等理论研究影响鉴证决策、鉴证供应商选择及鉴证者质量的因素; 在组织层面, 运用制度、资源依赖、利益相关者及合法性理论研究组织内部与社会责任报告信息生成、鉴证相关的特征和过程; 在个人/群体层面, 运用行为决策理论研究鉴证者如何获取和使用鉴证证据、目标用户对鉴证的反应<sup>[63]</sup>。Velte 和 Stawinoga 进一步阐释了上述框架: 在市场层面, 主要研究公司、公司治理及国家特定因素对社会责任鉴证及鉴证者选择决策的影响, 并从公司价值、资本成本、声誉评级等角度考察利益相关者的反应; 在组织层面, 主要运用调查、内容分析、案例研究和访谈等质性方法探讨鉴证者独立性、管理者态度、主观规范及管理者实施鉴证的动机等问题; 在个人/群体决策层面, 主要运用实验研究、访谈和调查方法, 从个人角度探究管理层社会责任鉴证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鉴证过程以及鉴证者的判断与决策行为<sup>[93]</sup>。上述框架不仅适用于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研究, 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 SA 研究同样适用。

从现有文献来看, 关于 SA 动因与后果的研究大多侧重在市场层面研究宏微观特征对 SA 决策的影响<sup>[47-50, 62]</sup>以及从市场反应<sup>[31, 88]</sup>、融资<sup>[90-92]</sup>等角度探究 SA 的后果, 较少在组织层面探究管理层 SA 决策的动机、目的以及管理层特质对 SA 的影响; 在个体层面, 除少量文献运用实验方法研究 SA 对投资者意愿的影响<sup>[87]</sup>等问题外, 关于 SA 行为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影响、鉴证者判断和决策行为的文献也相当缺乏。组织、个人/群体层面的研究缺乏, 使得我们全面了解 SA 行为及其后果。即便是在文献较为丰富的市场层面, 现有文献在研究 SA 后果时, 也主要考虑投资者<sup>[31, 88-89, 92]</sup>和债权人<sup>[90-91]</sup>, 而较少考虑供应商、职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对 SA 的反应。

#### (二) 研究方法不够多元

与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市场层面的特点相适应, 除在了解相关实务现状及困难时较多运用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外<sup>[16-18, 22, 24-25, 30]</sup>, 现有关于 SA 动因与后果的研究多采用经验研究方法, 仅有少量文献采用实验研究且主要集中在西方数据<sup>[73-74, 81, 87]</sup>, 采用实地访谈<sup>[73]</sup>、问卷调查<sup>[27-27]</sup>、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的文献更少。

实际上, 不同方法各有利弊。经验研究具有可验证和可重复性的特征, 但难以揭示 SA 决策黑箱; 实验研究能够较好地控制额外变量, 并能通过设计实验来研究现实中难以直接观察的现象, 但可能面临参与者代表性不足、模拟任务情景困难等挑战; 案例研究和访谈亦存在样本代表性不够、外部效度不足等问题。因此, 将不同方

法结合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入理解 SA 行为。例如,了解鉴证者做出判断的过程和影响因素,评估鉴证者在 SA 中判断和决策的质量及其差异,理解支撑鉴证者判断和决策的认知过程,探究鉴证者判断和决策的优化路径和方法,这些问题很难通过经验研究方法实现,而需要通过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行为研究、实验研究等手段来实现。研究不同管制政策(如强制性鉴证与自愿性鉴证)下利益相关者对 SA 感知和反应的差异,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实验方法,因为现实世界中很难有场景使研究者能够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观察强制性鉴证与自愿性鉴证作用的差异。现有文献研究方法较单一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 SA 行为的认识。

### (三) 缺乏明确而扎实的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代理理论、合法性、资源依赖、制度理论是研究 SA 问题常用的理论基础,也是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依据。在理论基础方面,现有文献有如下不足:一是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不够准确。例如,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主要关注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而 SA 语境下的代理冲突更多体现为管理层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这里所谓的代理理论,实际上是经典委托代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所形成的利益相关者代理理论(stakeholder agent theory)<sup>[93]</sup>。然而,一些文献在运用代理理论分析 SA 的动因时,所依据的实际上是传统的代理理论<sup>[67]</sup>。二是对理论基础选择的分析以及对结果的解释不够充分,难以排除其他动因的影响。三是有大量文献流于现象,未依据相关理论并立足所处环境对 SA 行为及其后果进行深度分析<sup>[5]</sup>。四是相关理论多立足于西方,其在我国及其他新兴市场中的适用性有待验证。

### (四) 中国背景的深层次 SA 研究较少

除早期关于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研究外<sup>[94-96]</sup>,中国背景的 SA 研究近年才开始兴起,且主题集中在国外规范的介绍和比较<sup>[34]</sup>、鉴证要素等基本概念阐释<sup>[42]</sup>、实务调查、描述与存在问题分析<sup>[11-12,18,23,97]</sup>等方面,仅陈嵩洁等<sup>[12]</sup>、宋献中等<sup>[78]</sup>、Huang 等<sup>[92]</sup>、薛爽等<sup>[89]</sup>等极少数文献对 SA 的后果进行了初步的差异性分析或实证检验。

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实施 SA 的数量和比例相对较低,但在相关国际组织推动、亲 ESG 机构投资理念及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相关规则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意识逐渐增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实施 SA 的公司数量已有明显增长。《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颁布实施后,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已成为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的强制性要求,本文预期公司自愿对可持续报告实施鉴证的动力将会增强。2026 年 1 月,财政部发布了适用于所有执行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的机构、所有类型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的《基本准则》,表明监管机构已经着手制定中国的 SA 系列准则,这将极大地推动事务所及其他鉴证机构规范开展相关业务。上述实践和制度的变化,不仅客观上要求加强中国背景的 SA 研究,而且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机遇。例如,我国 2024 年后可持续发展报告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性披露同时并存的特点,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来研究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对 SA 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需要加强中国背景 SA 研究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审计市场发展水平、投资者结构与素质、政府和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关注程度、可持续信息披露规则与公司实践等方面均与西方有所不同,这意味着西方 SA 研究的许多理论和结论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我国。例如,在我国,政府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一些“自愿”行为实际可能是“监管诱导性”行为。在监管部门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除非基于满足境外上市监管要求目的或相关市场参与者有明确要求等原因,企业较少会在显性成本较高而潜在收益不明确的情况下自愿实施鉴证。因此,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及其信息披露,不断制定规则推动上市公司加强可持续信息披露并鼓励实施鉴证,但由于监管部门虽一直鼓励但暂无有力措施推动公司对 CSR、ESG 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实施鉴证,购买 SA 业务的上市公司数量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现象蕴含了潜在的研究机会,至少有如下问题值得探讨:(1)在中国这种“政府监管导向为主”的环境下,阻碍多数公司自愿实施 SA 的原因是什么?少数公司购买 SA 服务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近年来实施 SA 的公司数量有所增长的具体驱动因素是什么?(2)利益相关者是否关注公司的 SA 行为,具体是哪些利益相关者关注 SA?(3)现阶段,中国公司实施 SA 的成本和效益有哪些,其对比关系如何?有哪些因素会对 SA 成本效益对比产生重要影响?(4)我国应当通过制度供给改变 SA 的成本收益对比来推动更多企业自愿实施 SA,还是要实施强制鉴证制度?上述问题难以从现有基于西方的研究中找到答案。

### (五) 许多关键性问题尚未解决

对于 SA 性质与作用等基本问题,现有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例如,SA 究竟是一种提高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可信度的主动治理手段<sup>[10,73-76]</sup>,还是公司合法性管理的被动性手段甚至是“漂绿”的工具<sup>[79-80]</sup>?现有研究结论并

不一致。本文认为,在不同情境下,SA 的动机、质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都会影响 SA 的本意定位或实际作用。例如,在市场参与主体对 SA 缺乏强有力的需求,公司自身可持续发展意识亦不足、只是迫于监管要求或同行压力实施 SA 的情况下,SA 很可能就是一种摆设;又如,即便有部分利益相关者关注 SA,但在相关基础设施不足,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虚假陈述行为缺乏明确惩罚机制、鉴证机构的法律责任制度和声誉机制不足的情况下,SA 更可能成为部分公司进行合法性管理的工具,甚至成为“漂绿”的手段;再如,在鉴证机构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鉴证准则、从业人员业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SA 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SA 自然不可能真正成为提高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机制。因此,SA 的性质和作用依赖管理层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动力、鉴证者业务质量、利益相关者关注、信息披露监管等多方面因素,不能一概而论。但现有文献对于不同场景下 SA 行为性质与作用差异的研究还不充分,因而并不能深入理解 SA 的性质与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认为现有文献对于 SA 的性质未达成一致看法,并不是说要去刻意追求结论的一致性,而是强调需要深入探究影响 SA 性质和行为的规律性因素。

SA 质量是理解 SA 作用与经济后果的关键。但现有文献对于 SA 质量的度量主要依赖形式化的内容分析,具有更高一致性、更低误差的 SA 质量测度尚待进一步开发;对于 SA 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质量下 SA 作用的差异,研究也不深入。

#### (六)对 SA 规范与实务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现有文献对于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相关国家或地区 SA 实践描述、相关规范的介绍和比较研究较多,对于 SA 具体方法与流程涉及较少,难以为鉴证机构开展 SA 业务提供指引。此外,由于目前仅有少数国家和地区部分引入强制性 SA 制度,尚缺乏对强制性鉴证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强制性鉴证与自愿性鉴证效率比较的研究,也缺乏对鉴证范围、频率等最优制度选择的理论分析,难以为是否要实施强制性 SA 制度提供依据。

### 四、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 (一)基于三层面框架,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

Cohen 和 Simnett<sup>[63]</sup> 及 Velte 和 Stawinoga<sup>[93]</sup> 的三层面框架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理解 SA 行为及其后果。仅从市场层面研究难以了解企业、管理层及鉴证者如何进行相关决策,难以真正揭开管理层 SA 行为的“黑箱”,也难以了解有关利益相关者是否真正关注公司 SA 行为及如何将其纳入判断和决策。因此,未来除了在市场层面采用大样本经验研究等方法研究 SA 的动因、后果与影响因素外,还应加强组织、个人/群体层面的研究。

在市场层面,应在实务调查和制度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与宏观角度拓展公司 SA 行为动因、后果与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中国研究者尤其应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 SA 问题,如环境督察、国有企业管理层晋升激励、党组织参与治理、“废监事会改审计委员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监管等制度及其变革对 SA 决策与效果的影响。在组织层面,可以依据资源依赖、制度等理论,运用问卷、实验、案例等方法,研究内部审计、管理层态度、内部考核与薪酬制度、同行行为、媒体压力等因素对企业 SA 决策的影响。在个体/群体层面,可分别以管理层、鉴证者、SA 用户为对象,采用实验、访谈等方法,研究上述群体 SA 相关判断决策的过程与质量。例如,就利益相关者而言,可以研究强制性与自愿性鉴证制度之下 SA 及其业务特征对投资者投资意愿、信贷者信贷决策、用户购买决策等的影响;就鉴证者而言,可以研究鉴证者对非财务信息错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监管与法律对鉴证者行为的影响、不同特征(如经验、背景)鉴证者决策的差异、鉴证者与管理层及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等问题。

在运用三层面框架时,除考虑鉴证委托者和鉴证报告用户外,还要考虑鉴证者。在对鉴证者特征进行测度时,除考虑其是否事务所外,还可以从声誉、执业经验与行业专长、对可持续业务的关注、与财务审计师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刻画,进而研究不同鉴证者的 SA 判断决策行为和鉴证质量。

#### (二)根据研究层面与问题,采用更加多元的方法

多层面研究意味着需采用多样化方法来研究 SA 问题。因为不同层面的研究适用不同方法:经验方法更适用于市场层面,而组织、个人/群体层面更多地依赖质性方法。我国现阶段实施 SA 的上市公司数量相对较少,这意味着采用大样本经验研究可能存在困难,案例分析、实验研究等方法可以弥补样本量不足的问题。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法不仅有助于了解已实施 SA 企业的动机、效果及影响因素,也有助于了解其他阻碍企业购买 SA 服务的原因以及事务所参与不足的原因。当然,问卷调查、访谈的信度与效度可能会受到受试者(受访者)立场、背景、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研究结论相悖的情况。因此,多元化方法结合才能更好地发现规律。

(三) 构建 SA 研究理论框架

构建 SA 理论框架的关键,一是要解决理论基础问题,二是要确立 SA 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内在逻辑。

1. 理论基础的探求与适用性检验

合法性、利益相关者、委托代理、信号传递、资源依赖、制度等理论常被用来解释 SA 动因和后果(表 1)。但是,在运用上述理论来研究 SA 问题尤其是中国 SA 问题时,首先需解决如下问题:(1)相关理论准确含义的确定及不同理论间差异的辨析。上述理论并非全新理论,在社会责任等领域早有应用。但在运用到 SA 时,不仅要依据经济学和管理学经典文献中的阐述确定其准确含义,而且要依据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与鉴证的特点,将相关理论与 SA 有机地联系起来。此外,要注意不同理论对于 SA 行为解释的差异并通过研究设计等手段加以区分,从而更加准确地确定 SA 行为的动机及相应理论。(2)相关理论在中国适用性的检验。上述理论源于西方,其在我国是否同样适用,需要经过验证。例如,信号传递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只有高质量公司才能承受鉴证成本、相关外部主体(信号接收者)关注鉴证并能够依据信号判断发送者类型。但在我国这样一个非专业投资者占比较高的市场中,投资者是否关注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及其鉴证、鉴证质量能否得到充分保证,都可能存在疑问。因此,在我国,信号传递理论是否能够解释 SA 行为,尚需证据。又如,在我国,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时,除了考虑投资者、债权人、客户、供应商等群体外,还应考虑政府部门、党组织、职工的影响。

表 1 SA 决策动因与后果的主要理论基础

理论	基本含义	动因及研究视角	后果及研究视角
合法性	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对其进行鉴证是企业阐明对社会期望的实现程度,从而获得社会对企业经营的许可的手段	合法性需求;法治环境、行业敏感性、ESG 危机管理、ESG 绩效	危机后公司价值修复、ESG 投资与绩效
利益相关者	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对其进行鉴证是获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支持的重要手段	利益相关者导向;商业文化、利益相关者压力	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如客户好感度、职工满意度等
委托代理	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对其进行鉴证是约束管理层 ESG 及其披露行为、缓解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代理冲突的手段	公司治理;董事会及可持续委员会特征、薪酬契约	ESG 披露质量、财务报告质量、漂绿、ESG 绩效等
资源依赖	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对其进行鉴证是提高企业声誉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手段	董事会特征、管理层能力	企业声誉、融资成本、市场势力等
信号传递	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对其进行鉴证是对外传递企业可持续发展质量信号,降低可持续相关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手段	信息不对称程度、ESG 表现与披露质量、融资需求	企业价值、投资者决策、融资成本等
制度理论	企业需要遵循所在社会和行业的规范,包括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与鉴证方面的规范	同群效应	融资成本、供应链价值等

2. 研究框架的构建

本文认为,可以将动机与后果联系起来,依照“动因-行为-后果”的框架,系统探究公司的 SA 行为(如图 1)。这一框架的优势包括:(1)能够由因及果、追因溯果地研究 SA 行为,因而更具系统性、逻辑性;(2)有助于评估 SA 的成本与效益;(3)通过将公司及其管理层、鉴证者、使用者、内外部环境等纳入这一框架,有助于理解 SA 动因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预期作用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4)可以将 SA 行为自身也纳入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论研究与实务研究的结合;(5)不仅适用于市场层面,也适用于组织、个体/团队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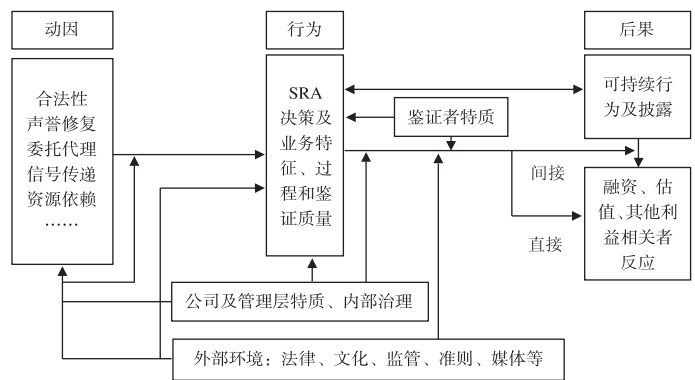


图 1 SA 研究框架

“动因-行为-后果”框架确立了 SA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1)在动因方面,要在制度背景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公司及其管理层是否具有通过 SA 来对外表明其经营合法性、传递公司质量的信号、修复或提高声誉、获取资源等动机。在研究中,尤其应当关注在我国上市公司实施 SA 的动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公司的自愿性 SA 行为究竟是为了提高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可信度、对外传递公司可持续发展质量的信号,还是将 SA 作为一种合法性管理工具甚至是“漂绿”的手段?哪些因素会影响上述性质?如果 SA 是一种工具性行为,投资者等用户是否能够识破?(2)在行为方面,不仅要关注 SA 的鉴证主体、鉴证范围、保证水平等外在业务特

征,更应关注 SA 的过程和鉴证质量,从而更加全面地刻画 SA 行为并进一步考察其影响因素和差异性后果。(3)在后果方面,要从 SA 对相关结果变量的直接作用及通过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行为与披露而产生的间接作用两方面考察 SA 的后果。SA 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能够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行为。其次,通过影响可持续发展信息质量与行为,SA 还可能对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和决策产生影响,即可持续信息披露在 SA 与相关结果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最后,SA 还可能通过信号传递等途径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行为。因此,在研究 SA 后果时,首先要考察 SA 对可持续发展行为及相关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其次考察 SA 对公司融资、供应链价值、企业声誉和价值等结果变量的影响,并在排除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自身影响的基础上区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在运用“动因-行为-后果”框架研究 SA 时,需注意如下 3 点:

(1)关注差异。在这一框架下,鉴证需求者特征、供给者特质以及公司所处内外部环境是重要的调节变量。就需求者而言,不同公司和管理层在获取资源、消除合法性危机等方面的诉求不同,SA 能够带来的收益和潜在成本也不同,这不仅会影响公司是否购买 SA 的决策,而且会影响公司对 SA 范围、主体等的选择;公司治理等特质不仅会影响公司对 SA 的内在需求是否会转化为实际行动,而且会影响 SA 质量并进一步影响 SA 的作用。就鉴证者而言,其类型、经验、行业专长、声誉等特质会影响鉴证质量,进而影响 SA 作用的大小。就外部环境而言,SA 潜在用户群体特征、可持续信息披露规则与监管、文化、法律制度与执法机制、其他外部治理力量等因素,不仅会影响公司和管理层购买 SA 的动因、SA 行为的性质,而且会影响 SA 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影响公司潜在的 SA 需求是否能转化为实际行为;环境还会影响 SA 质量并对 SA 作用的发挥产生调节作用。因此,无论是研究动因、行为还是后果,都要考虑公司、鉴证者和外部环境的差异。例如,在研究 SA 后果时,可以关注财务审计师质量及其对可持续事项关注度、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质量、内部审计质量及内部审计是否介入 ESG 事项等公司特质的影响,并考虑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ESG 关注度、ESG 评级机构及评级结果、媒体监督力度等外部因素的调节作用。

(2)回归本源,聚焦 SA 的核心用户——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是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重要出发点。未来研究应加强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考虑:在研究 SA 的动因与影响因素时,可以将政府、绿色信贷机构、中小投资者、社区、职工、媒体、分析师等主体纳入研究视角,以考察上述利益相关者对公司 SA 决策的影响;在研究 SA 行为时,应考察利益相关者对 SA 过程的参与;在研究 SA 后果时,除了从资本市场反应、公司价值、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等角度考察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反应外,还可以考察客户、供应商、职工、分析师、财务审计师等主体是否关注公司 SA 行为。除考虑外部利益相关者外,还应关注管理层自身<sup>[10,18]</sup>,在市场或组织、个体层面考察 SA 对管理层内部决策的影响。

(3)评估 SA 的成本、收益及其影响因素,为推动 SA 制度与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公司实施或不实施 SA,都是在对相关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一方面,要通过考察 SA 的后果来考察 SA 的增量作用,以评估其潜在收益。另一方面,要从鉴证费用、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声誉损失等角度研究 SA 成本,从而深入理解 SA 的成本与收益及其对 SA 决策的影响。鉴证费用是 SA 成本的重要构成,也是阻碍公司购买 SA 服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缺乏公开数据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调查方法来获取 SA 费用数据,进而研究其影响因素。

(四)以 SA 质量为核心,拓展研究深度

SA 质量是影响 SA 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是 SA 问题的核心所在。要拓展研究深度,需要进一步以 SA 质量为核心,在对 SA 质量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研究其影响因素与后果。

#### 1. 开发 SA 质量的可靠度量

现有文献多从 SA 报告是否包含相关鉴证准则或指南中所规定的要素来评价 SA 质量,过于注重形式,并不能充分度量 SA 质量。因为,形式上合格并不代表高质量。SA 报告中较全面地包含指南所规定要素,仅表明鉴证者达到了鉴证的最低要求,并不能反映鉴证者在鉴证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职业谨慎、做出了恰当判断、发现并指出相关信息披露与事实或标准不一致之处。这种依照鉴证报告形式上的广度而忽视鉴证工作自身质量的思路,容易错误地将模板化的报告评价为高质量。本文认为要从 SA 对可持续信息质量的保证程度,也就是鉴证者是否能够发现并报告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中的错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 SA 质量,从而将 SA 质量与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联系起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可持续信息披露可信性的 SA 是高质量的;反之,如果鉴证者未能发现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中的“言过其实”“无中生有”等错报行为以及漏报、误导

性披露行为,则是低质量的SA。与审计文献中常用审计后财务报告质量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相类似,在不能获取鉴证调整建议的情况下,经鉴证后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可作为SA质量的替代变量。不过,SA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信息质量毕竟是两个不同概念。为了反映SA对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的“增量作用”,还需要考虑鉴证过程与产出。审计文献中从投入、过程、产出以及用户的感知与反应等角度度量审计质量的做法<sup>[98]</sup>可以为SA质量度量提供参考。具体而言,可以从鉴证者类型与行业专长、鉴证费用与工时、鉴证范围、鉴证调整建议、鉴证意见类型、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包括漂绿)、ESG处罚及其他负面信息等不同角度测度SA质量。

## 2. 考察SA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后果

在对SA质量进行相对准确的测度后,就可以从多个维度研究SA质量的影响因素及不同鉴证质量下SA作用的差异。除了从鉴证主体、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等角度考察SA质量的影响因素外,还可以进一步运用数理、实验或经验方法,从报告框架(指南)和鉴证准则的选择、可持续信息披露监管及其变迁、强制/自愿鉴证等角度研究SA质量及后果的差异,以便为相关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例如,研究不同鉴证准则对SA质量和作用的差异性影响,将有助于我国在制定可持续信息鉴证准则时选择合适参照。

### (五)加强中国背景SA研究,进而着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 1. 立足中国制度背景,研究中国SA问题

研究中国SA问题时,要着重考虑中国上市公司产权性质、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特点以及审计、执法机制等制度特征的影响,进而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SA理论。例如,党组织参与治理、地区环保压力与环保监管强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国有企业业绩考核、民营企业“原罪”嫌疑、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制度可能会对公司实施SA的动因与效果产生影响,但现有文献尚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党组织参与治理这种中国特有的治理制度为例。一方面,党组织参与治理可能会推动管理层更好地落实党和政府在环境保护、共同富裕等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促使公司积极实施SA,以便向外部传达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展现公司经营的合法性,并可能会督促鉴证机构切实提高鉴证质量。因此,党组织治理对公司SA决策及其效果可能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党组织参与治理本身能够在抑制“漂绿”、实质性提高公司环境社会事项的合规性等方面发挥治理作用。相应地,公司通过SA来传递信号、表明合法性的动力会下降,SA对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及其他方面的作用也可能下降。因此,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公司实施SA的动力与SA效果的影响是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

#### 2. 着力构建中国SA自主知识体系

在立足国情、运用中国理论对中国SA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中国SA的知识和规律,从而构建中国SA自主知识体系,并作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SA是审计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基于中国背景、依据本土特色理论来探究中国SA问题,将成为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面。董必荣等认为,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中国自主与中国特色”“体系完整与逻辑自洽”“源自实践与服务实践”“自信开放与引领国际”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归依,从而形成中国自主的审计概念体系和基本理论<sup>[98]</sup>。这对于SA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同样适用。在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目标下研究中国SA问题,不仅要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相关规律,更关键的是要在对实践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从鉴证目标、鉴证环境、鉴证功能、鉴证客体与对象、鉴证需求与供给、鉴证方法与程序等方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SA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并通过比较、鉴别、总结提炼,得出中国原创、独特、自主的SA知识体系。

### (六)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加强SA规范和实务问题研究

#### 1. 加强对中国SA实践的调查与分析

对实践进行调查,不仅有利于了解实务、获取第一手资料,为相关部门进一步制定和优化相关政策提供依据,而且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思路和实践支撑。一方面,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调查。既要调查已实施SA公司的动机、目的、决策过程中的具体考量和效果,也要调查多数公司未实施SA的顾虑,以评估SA的现实需求和阻碍因素。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事务所及其他鉴证机构的调查。既要了解事务所SA业务开展的基本情况、推动和阻碍因素、针对潜在障碍可能的解决方案,也要了解各类机构在鉴证程序和方法方面的经验做法,如重要性的确定、风险的评估、对专家工作的利用等,并加以总结、推广,以推动SA实践发展。

#### 2. 强化对中国SA规范制定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进入半强制、SA实践逐渐增多的背景下,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可持续信息鉴证

业务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体系,以规范 SA 行为、保证 SA 质量。《基本准则》的出台,只是可持续信息鉴证规范的起点。为了保证相关准则规范的科学性、前瞻性,研究者不仅要加强对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相关规范、指南的跟踪、对比和分析,而且要立足中国情境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具体而言,要运用理论、实验或经验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如下问题:(1)我国是否要建立强制性鉴证制度?强制性 SA 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及其影响因素如何?如果实施强制鉴证的话,是对整个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鉴证,还是仅对其中部分关键性内容或指标进行鉴证?在强制鉴证制度下,SA 应定位于有限保证还是合理保证业务?鉴证频率对其作用的影响如何,是否要规定鉴证频率?在鉴证主体和国际相关规范多样性背景下,鉴证规范的制定机构和实施对象范围如何确定,即如何解决中注协牵头制定的准则对其他非事务所鉴证机构的适用性问题?是否要设立过渡期和豁免制度?(2)如果是继续坚持自愿鉴证的话,如何提高企业实施 SA 的动力?(3)在强制性鉴证和自愿性鉴证之下,公司、鉴证机构、专家的法律 responsibility 分别如何确定?(4)如何处理财务报表审计与 SA 的关系(整合实施 vs 独立实施)?如何避免 SA 业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冲击?等等。除了对业务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外,还有必要对 SA 能力框架、人员和机构资格准入等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为建立中国 SA 培训与教育体系提供支撑。

### 3. 加强对 SA 程序与方法的研究

审计理论研究必须立足实践,并为实践创新提供有效解释、对实践问题提供解决方案<sup>[99]</sup>。SA 在证据获取和评价上与传统财务审计有着巨大差异,且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引。因此,对于多数事务所和其他机构而言,SA 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新业务。研究者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现状、趋势以及对一线鉴证人员的调研,就相关数据的获取及其鉴证方法、程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为实务提供指南。此外,还要针对当前 SA 实践中所面临的标准、技术、制度、市场及价值等多个层面的障碍,有针对性地研究如何系统构建我国 SA 体系并推动该体系落地。

### 参考文献:

- [1] O'Dwyer B., Owen D., Unerman J. Seeking legitimacy for new assurance forms: The case of 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1, 36(1): 31-52.
- [2] Zhou S. Reporting and assurance of climate-related and other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J].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 2022, 32(102): 315-333.
- [3] KPMG. The move to mandatory reporting: Survey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2024 [R]. 2024.
- [4] Venter E R., Van E L. Research on extended external reporting assurance: Trends, themes, and opportunit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 2021, 32(1): 63-103.
- [5] Hazaea S A., Zhu J., Khatib S F A., et al.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practic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2, 29(4): 4843-4864.
- [6] 乔璐, 王佳妮, 刘思义, 等.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鉴证: 现状分析、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5(1): 50-56.
- [7] Mock T J., Strohm C., Swartz K M. An examination of worldwide assured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J].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 2007, 17(41): 67-77.
- [8] Junior R M., Best P J., Cotter J.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nd assurance: A historical analysis on a world-wide phenomen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 110(1): 1-11.
- [9] Bakarich K M., Baranek D., O'Brien P E. 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assurance [J]. *Current Issues in Auditing*, 2023, 17(1): A1-A21.
- [10] Gipper B., Ross S., Shi S X. ESG as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24, 30(2): 1753-1803.
- [11] 陈晓艳, 洪峰. 企业 ESG 鉴证: 进展、问题与思考[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9): 79-83.
- [12] 陈嵩洁, 薛爽, 张为国. 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 准则、现状与经济后果[J]. *财会月刊*, 2023(13): 12-23.
- [13] Larrinaga C., Rossi A L., Vilechez M., et 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services: A comparison between Italy and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0, 163(1): 67-83.
- [14] O'Dwyer B., Owen D L. Assurance statement practice in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 critical evaluation [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05, 37(2): 205-229.
- [15] Boiral O., Heras-Saizarbitoria I., Brotherton M. Assess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The auditor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5(4): 703-721.
- [16] Channuntapipat C., Samsonova-Taddei A., Turley S. Exploring diversity in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practice Evidence from assurance providers in the UK [J].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2019, 32(2): 556-580.
- [17] Boiral O., Saizarbitoria I., Brotherton M., et al. Ethical issues in the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Perspectives from assurance providers [J]. *Journal of*

- Business Ethics,2019,159(6):1111-1125.
- [18] 沈洪涛,谢任依,赵阳. 可持续报告鉴证的利益相关方认知:一项访谈研究[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24(7):58-63.
- [19] Knechel W R. The future of assurance in capital markets:Reclaiming the economic imperative of the auditing profession [J]. Accounting Horizons,2021,35(1):133-151.
- [20] Becker L L,Stead J G,Stead W E.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A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CPA firms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Quarterly,2016,17(3):29-37.
- [21] Horne E,Loftus S,McCoy S S,et al. Attrac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ccountants:The joint impact of sustainability emphasis and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on accounting career perceptions [J].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2024,43(1):191-209.
- [22] Ballou B,Casey R J,Grenier J H,et al. Exploring the strategic integ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Opportunities for accounting research [J]. Accounting Horizons,2012,26(2):265-288.
- [23] 陈嵩洁,薛爽,张为国,等. 会计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基于11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调研访谈[J]. 审计研究,2024(1):28-40.
- [24] Soh D S B,Martinov-Bennie N. Internal auditors' perceptions of their role in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assurance and consulting [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2015,30(1):80-111.
- [25] Rakipi R,D'Onza G. The involvement of internal audit in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risks;Stakeholders' salience and insights from audit committees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2024,28(3):522-535.
- [26] Soh D S B,Martinov-Bennie N.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ternal audit's involvement i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ssurance and consul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2018,22(3):404-421.
- [27] DeSimone S,D'Onza G,Sarens G. Correlates of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involvement in sustainability audit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2021,25(2):561-591.
- [28] Manetti G,Toccafondi S. 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i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ssura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107(3):363-377.
- [29] O'Dwyer B,Owen D L. Seeking stakeholder-centric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J]. Journal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2007,25(6):77-94.
- [30] Edgley C R,Jones M J,Solomon J F. Stakeholder inclusivity i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port assurance [J]. Accounting,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2010,23(4):532-557.
- [31] Jeriji M,Nasfi A. The value relevance of mandatory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ssurance [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23,37(2):122-138.
- [32] Pandey D K,Kumari V,Palma A,et al. Impact of ESG regulation on stock market returns:Investor responses to a reasonable assurance mandate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24,64,105412.
- [33] 肖红军,丁凤茹. 中国 ESG 发展:“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J]. 改革,2025(4):44-62.
- [34] 王霞. ESG 报告鉴证国际发展趋势与建议[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23(7):121-126.
- [35] 王鹏程. 可持续信息鉴证制度:发展趋势与顶层设计[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24(7):64-67.
- [36] 刘明辉,王鹏程. 可持续信息鉴证:分歧与选择[J]. 会计研究,2025(10):3-16.
- [37] Manetti G,Becatti L. Assurance service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s:Standard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9,87(Supplement 1):289-298.
- [38] Krasodomaska J,Simnett R,Street D L. Extended external reporting assurance:Current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2021,32(1):104-142.
- [39] 黄世忠. 可持续披露准则十大热点问题分析[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24(6):11-16.
- [40] Wallage P. 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An auditor's view [J].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2000,19(Supplement):53-65.
- [41] Srivastava R P,Rao S S,Mock T J.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of assurance service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An evidential reasoning approach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2013,27(2):107-126.
- [42] 程博,胡朝会,殷俊明,等. 中国情景下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研究——基于 ISSA5000 与双重重要性原则的整合框架[J]. 会计研究,2025(9):22-34.
- [43] Bakarich K M,Castonguay J,O'Brien P E. The use of blockchains to enhanc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nd assurance [J]. Accounting Perspectives,2020,19(4):389-412.
- [44] Gu Y,Dai J,Vasarhelyi M A. Audit 4.0-based ESG assurance:An example of using satellite images on GHG emiss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2023,50,100615.
- [45] Moroney R,Trotman K T. Differences in auditors' materiality assessments when audit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6,33(2):551-575.
- [46] Canning M,O'Dwyer B,Georgakopoulos G. Processes of auditability in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 the case of materiality construction [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2019,49(1):1-27.
- [47] Simnett R,Vanstraelen A,Chua W F. 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84(3):937-967.
- [48] Kolk A,Perego P. Determinants of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statements: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

- ronment, 2010, 19(3): 182 – 198.
- [49] Zhou S, Simnett R, Green W J. Assuring a new market: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untry-level and company-level factors on the demand for greenhouse gas (GHG) information assurance and the choice of assurance provider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6, 35 (3): 141 – 68.
- [50] Braam G, Peeters 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and 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s: Diffusion of accounting practices in the real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5(2): 164 – 181.
- [51] Herda D N, Taylor M E, Winterbotham G. The effect of country-level investor protection on the voluntary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 2014, 25(2): 209 – 236.
- [52] Fernandez-Feijoo B, Romero S, Ruiz S. Multilevel approach to sustainability report assurance decisions [J].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 2015, 25(4): 346 – 358.
- [53] Gillet-Monjarret C.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 A Study of media pressure [J]. *Accounting in Europe*, 2015, 12(1): 87 – 105.
- [54] Emma G, Emiliano R, Jennifer M. High-quality assurance, ESG legitimacy threats and board effectiveness [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online 16 April 2024, 101385.
- [55] Martínez-Ferrero J, García-Sánchez I.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and assurance providers: Corporate governance determinants in stakeholder-oriente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17, 23(5): 647 – 670.
- [56] Peters G F, Romi A M.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ssurance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5, 34(1): 163 – 198.
- [57] Al-Shaer H, Zaman M. Credibility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The contribution of audit committees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8, 27(7): 973 – 986.
- [58] García-Sánchez I, Raimo N, Amor-Esteban V, et al. Board committees and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assurance servic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2023, 27(1): 1 – 42.
- [59] Simic S, Luo L, Datt R. Compensation and carbon assurance: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24, 28(2): 307 – 327.
- [60] Fan H, Tang Q, Pan L.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arb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ndependent carbon assurance [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21, 53(1), 100971.
- [61] Kao M, Jian C, Tseng C. Managerial ability and voluntary ESG disclosure and assur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 [J].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Policy Journal*, 2024, 15(1): 207 – 231.
- [62] Fernandez-Feijoo B, Romero S, Ruiz S. Financial auditor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oes it matter?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5(3): 209 – 224.
- [63] Cohen J R, Simnett R. CSR and assurance services: A research agenda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5, 34(1): 59 – 74.
- [64] Channuntapipat C, Samsonova-Taddei A, Turley S. Variation in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practice: An analysis of accounting versus non-accounting providers [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20, 52(2), 100843.
- [65] Zaman R, M B Farooq, Khalid F, et al. Examining the extent of and determinants for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quality: The role of audit committees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1, 30(7): 2887 – 2906.
- [66] Alshali K, Malague O R, Marques A. Board attributes and companies' choice of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providers [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2024, 54(4): 392 – 422.
- [67] Maroun W.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use of external assurance for integrated reports [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22, 30(5): 584 – 607.
- [68] Hummel K, Schlick C, Fifka M. The role of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and accounting assurers in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engagement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4(3): 733 – 757.
- [69] Perego P, Kolk A. Multinationals' accountability on sustainability: The evolution of third – party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2, 110(2): 173 – 190.
- [70] Dalla Via N, Perego P. The relative role of firm incentives, auditor specialization, and country factors as antecedents of nonfinancial audit quality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20, 39(3): 75 – 104.
- [71] Martínez-Ferrero J, García-Sánchez I. The level of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The effects of brand reputation and industry specialisation of assurance provide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8, 150(4): 971 – 990.
- [72] García-Sánchez I, Raimo N, Uribe-Bohorquez M, et al.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stakeholder engagement: Do assurance quality and assurer attributes matte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22, 26(3): 388 – 403.
- [73] Xiao X, Shailer G. Stakeholders' perception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credibility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22, 54(1), 101002.
- [74] Hsueh J W.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credibility gap: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family businesses'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8, 153(4): 547 – 568.
- [75] Hodge K, Subramaniam N, Stewart J.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Impact on report users' confidence and perceptions of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J].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 2009, 50(19): 178 – 194.

- [76] Michelin G, Patten D M, Romi A M. Creating legitimacy for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sustainability restatements [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9, 28(2): 395–422.
- [77] Luo L, Tang Q, Fan H, et al. Corporate carbon assurance and the quality of carbon disclosure [J]. *Accounting & Finance*, 2023, 63(1): 657–690.
- [78] 宋献中, 李双怡, 王筱棠. ESG报告鉴证是否降低了ESG评级分歧? [J]. *财务研究*, 2023(6): 40–51.
- [79] Talbot D, Boiral O. GHG reporting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 assessment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from the energy sector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8, 147(2): 367–383.
- [80] Boiral O, Brotherton M, Talbot D.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Building confidence in ESG disclosures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through external assurance [J]. *Business Ethics, the Environment & Responsibility*, 2024, 34(4): 617–632.
- [81] Channuntapipat C. Can sustainability report assurance be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and practice beyond the ritual of verification?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1, 30(2): 775–786.
- [82] Reimsbach D, Hahn R, Gürtürk A. Integrated reporting and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professional investor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8, 27(3): 559–581.
- [83] AlShaer H, Zaman M. CEO compens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ssurance: Evidence from the UK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8(1): 233–252.
- [84] Steinmeier M, Stich M. Does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improve managerial investment decisions? [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9, 28(1): 177–209.
- [85] Bui B, Houqe M N, Zaman M.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arbon assurance and reporting integrity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1, 30(8): 3839–3853.
- [86] Fuhrmann S, Ott C, Looks E, et al. The contents of assurance state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2017, 47(4): 369–400.
- [87] Cheng M M, Green W J, Ko J C W.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relevance and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on investors' decision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5, 34(1): 131–162.
- [88] Reverte C. Do investors value the voluntary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stock market [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 29(5): 793–809.
- [89] 薛爽, 陈嵩洁, 吴富中. 可持续信息鉴证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来自H股折价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25(8): 137–150.
- [90] Carey P, Khan A, Mihret D G, et al.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capital constraint and cost of deb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21, 25(2): 351–372.
- [91] 陈美惠, 吴宴惠. ESG第三方确信、负面社会责任新闻报导与债务资金成本间之关联性[J]. *会计评论*, 2024(1): 1–43.
- [92] Huang H, Tang L, Zhao L. Do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disclosure assurance reduce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2025, 25(1): e70006.
- [93] Velte P, Stawinoga M.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surance (CSRA): a literature review [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87(8): 1017–1066.
- [94] 李正, 官峰, 李增泉.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影响因素研究 [J]. *审计研究*, 2013(3): 102–112.
- [95] 沈洪涛, 陈涛, 黄楠. 身不由己还是心甘情愿: 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决策的事件史分析 [J]. *会计研究*, 2016(3): 79–86.
- [96] 朱文莉, 许佳惠. 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2): 43–53+104.
- [97] 王艳, 杨晓婕, 张家荣, 等. 会计师事务所ESG鉴证服务发展情况的问卷调查分析 [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4(12): 58–66.
- [98] 董必荣, 徐志耀, 陈汉文. 论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1): 1–15.
- [99] 徐玉德, 李艺玮, 崔菁颖. 新时代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实践进阶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4): 1–10.

[责任编辑:刘 茜]

## Research on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SA): Review and Prospects

LI Minghui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Globally,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voluntarily adopting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SA) has been growing. Scholars have investigated the motiv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SA based on surveys and descriptions of related practices, contributing to some exte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entives and effects of voluntary SA decisions. However, current SA-related research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overall, with significant room for expansion in terms of breadth, depth, and other aspects – particularly given the severe lack of SA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lve deeper into the motiv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SA from multiple levels and using more diverse methods, grounded in enhance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s, while striving to build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SA.

**Key Words:**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S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ESG repor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ttest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isks;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